

奢侈品考古报告

杭春晓

内容摘要：奢侈品作为近代商品概念，隐含了一种社会消费的分配机制。这一概念也因此具备了社会历史分析的价值。本文将奢侈品作为人类历史心理解读之线索，细致辨析了古典社会、现代社会中关乎奢侈品的消费原则，进而探讨了平等与现代性的矛盾关系。在此基础上，奢侈品的分配机制也成为现代性的反思通道，并决定了科技进一步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与可能出现的“危机”。

关键词：奢侈品、平等、消费、现代性、科技发展

一

海昏侯被发掘，惊叹了世人。成堆的马蹄金，足以满足观众的幻想——关乎王侯的奢华生活。尸骨无存的刘贺，无法想象尚有如此奇遇，成为万人围观、热议的对象。跨越时空无尽的隔绝，海昏侯，一位曾经的皇帝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位历史的“失败者”，应该庆幸自己的失败。或许，因为远离帝陵，他的冥寝才能安然。当然，这只是假设。历史与今天，没有规律可谈。海昏侯，注定将会重现，以直观可见的方式跳离文献的尘封。应该感谢考古学，它每次引人注目的发掘都像充满想象力的剧目。虽然学者的努力不在此，但围观者不需要地层，也不需要灰坑。他们需要的是九层塔妖，以及代表财富的马蹄金。

刘贺下葬时，多的就是马蹄金。一层层，几乎铺满了冥居。面对如此奢侈的墓葬，人们充满了揣测的快感。一个被废黜的天子，在黄金铺就的棺床上沉睡，等待后人打开他依然富贵的场景。宛如童话，刘贺用数量惊人的财富述说自己的生活。然而，人们还是为刘贺遗憾，带着吃瓜观众特有的情绪。因为充满悬疑的开棺视频，最终没有带来金缕玉衣。这是一种特制的下葬衣物，可追溯东周的“缀玉面幕”、“缀玉衣服”。大致而言，就是用金线缝结玉片，形如铠甲包裹身体。犹如玉盒子，故称“玉匣”。为什么搞这么费劲的葬衣？古人认为玉是“山岳之精”，置于人的九窍，精气不会外泄，尸骨因此不腐，可求来世再生。习惯了火化的现代人，对此自然不屑。但在刘贺时代，它确是大家共同的信仰。

信仰是极具动能的精神活动。它能制造最无畏的劳动，为了看似合理的理由。金缕玉衣正如此，汉代专设“东园”制作这种奢侈品：众多玉工通过选料、转孔、抛光等十多道工序处理海量玉石，再按人体不同部位设计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片，终以金线相连。当时，一件中型玉衣的耗费相当百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难怪，今日各大博物馆对金缕玉衣都绝对顶礼。1968年，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共用玉片 2498 片，金丝重 1100 克，堪称奢侈品中的奢侈品。同样，人们也希望刘贺的墓中，不仅有数量惊人的马蹄金，还有王室独享的奢华葬衣。遗憾的是，由王到帝再到侯的刘贺，身后没能穿上这套沉重的“铠甲”——充满象征性的奢侈品。

作为奢侈品的金缕玉衣，仿佛久远的欲望主体，在尘封的古墓静穆独处。哪怕没有任何观众，它从人间走向阴间的瞬间就寄生了权力的发条。如果没有后人惊扰，它将一直保持闭棺一刻的庄严、神圣，与“不朽”肉身共存。刘贺最终没有这样的资格，肯定不是他的意愿，也定然与金钱无关。身无玉衣的刘贺，是一种隐喻，是一种身份确认的制度。假设他没有成为皇帝，曾经的王位也能让他在“玉匣”中安享尊荣。遗憾的是，特殊履历使他无权消费顶级的奢侈品。对此，吃瓜观众唏嘘一番，也就罢了。身为当事人的刘贺，难能如此。金缕玉衣的缺失，不仅是权力的缺失，更是一种象征的缺失，是他沉浮人生的巨大缝隙。这个缝隙中，一切荣辱惊悚都难以填充心理上的波折。

二

奢侈品，伴随人类文明的出现而出现。如果文明在秩序的构建中产生，那么身份区别一直以来就是严肃而认真的问题。显然，奢侈品正是身份差异的重要象征。刘贺与顶级奢侈品的关系，恰是这一问题的表征。刘贺下葬时的具体观众，已无法考证。想来，只会是他的家人。但目睹刘贺下葬的人们，并非葬礼的真正观众。这一带有庄严色彩的社会行为，向来是礼制审查的对象。也就是说，葬礼真正的观众是社会制度，一种权力规训下的集体之眼。刘贺并非没有财力消费金缕玉衣。但在礼制的监督下，他只能用玉蝉、玉塞企盼肉身不腐。这是一种区隔，一种外于个体的制度隔离。玉衣和玉蝉，都指向汉人的肉身想象。所以，它们的差异不是信仰的差异，而是身份与权力的差异。某种角度看，它们是等级化的奢侈品，并因等级分配而具有了政治性。

或许，古代奢侈品从来不曾脱离政治。我们用消费主义的名词——奢侈品来称谓古人行，存在某种误导：“消费”看似平等的权力，为曾经的不平等笼罩了一层暧昧、温情的面具。实际上，刘贺时代，这种消费的区别是简单粗暴的，往往与强制性行为规范紧密相连。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时的“礼乐制度”，很难想象权力划分可以细致到生活的一言一物。看似琐碎、局部的规定，构建了整体形态的统一性——被称为“和”的社会秩序。身处如此秩序，个体消除了个体的独立，成为宏观目标的零件、构件。奢侈品的使用权限，正是这种规定性的细节显现。刘贺在玉衣消费上的“得而复失”，亦是之规定之个体的完美案例。

刘贺几近疯狂地使用马蹄金——迄今为止中国古墓用金量之最，似乎构成了一种心理补偿。然而，这仅是个体的自我迷幻，无法抚平金缕玉衣在制度上的巨大沟壑。与中山靖王刘胜的安然长眠相比，刘贺终究多出些不甘的欲望。无论海昏侯出土了多少黄金，除金缕玉衣外，满城汉墓的“长信宫灯”、“朱雀衔环杯”也足以让刘贺的奢华变得黯然。如同今日网上流行的“土豪金”——隐含了某种身份揶揄，用黄金填满的海昏侯墓或许正是刘贺主体幻觉的自我装扮：在财富的消费中建构身后奢华，却无法指认身份。因为财富不代表消费权，刘贺的“土豪金”不能弥补缺失，相反成为他无法抵达的欲望象征。虽然，财富在运用中可私下“僭越”，奢侈品分配在某些场合也会失效。但“失效”终究是个人的冒险，必须承担行为公开后的相应危险。和珅被定死罪的理由就有一条：私盖金丝楠木屋，奢侈豪华，超标准、超规格。

用什么木料建筑私宅，正如用什么玉器包裹肉身，都是制度化的分配机制。刘贺没有和珅的圣宠，是在新皇猜忌下度日，自然不敢半点雷池。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财富与奢侈品之间的等号关系，在刘贺直至和珅时代，都不成立。彼时，奢侈品与其说是财富的象征，莫不如说是权力的象征，是政治秩序的象征。个人欲望，是政治分配的结果，是礼制规训的结果。欲望的构成是历史累积的制度设计，带有预设的强制性，是一种显然的不平等。然而，吊诡处在于：看似违背平等的规定在所有人无意识中成为准则时，它却带来“各安天命”的社会和谐，并成为潜在的治国之道。奢侈品，正是这种“治道”最直观的显现，也是最有效的心理暗示。

三

奢侈品与财富的等号是近代社会变革的结果。改变，是整体结构性变化——将粗暴的规定转变为隐藏的运营。之所以发生这般改变，是因为关于“人”的看法出现了一些突变。此前，我们将人看作某种结构化世界中的零件组成，诸如神学世界、伦理世界等。如此看法下，刘贺首先不是刘贺，而是纲常结构中的刘贺。他的欲望、他的行迹，都是这个结构给予并规定的。对个体而言，预设结构就是先验的不平等，是天然的等级划分，很难逾越。陈胜吴广

惊天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看似强悍地抗争不平等，实是希望改变自己在结构中的地位，而非否定不平等的存在。故而一旦有人幸运地改变了地位，就立即维护起他曾反抗的结构。

近世以来，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方向上的转变。我们将人从结构化世界中抽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理论上的“人”。这个“人”，不再受制某种曾经的结构，并被赋予“假设”的平等：围绕理论存在的人之主体，我们重新调整了个体的言行准则，给予个体践行平等的权力。如此改变中，奢侈品是最突出、也最直观的变化之一。原因很简单，过去的结构，奢侈品使用权就是赤裸裸的不平等。刘贺可以拥有数量惊人的黄金，但永远不能消费金缕玉衣。奢侈品不等同财富而等同政治的旧逻辑，使现代奢侈品一旦脱离政治预设，就自然对比出主体在权力上看似平等的美好蓝图。

当奢侈品与政治的强制规定消失，转而与财富构成等号，众生平等的幻象忽然间降临了人世。然而，这只是观念上的幻觉。表面看，强制的政治分配消失了，人们可以自由消费。实际上，正如“人”的权利是一种理论表述，自由消费也仅是理论的表述。将奢侈品剥离政治秩序，建立奢侈品与财富的等号关系，没带来真正的平等。或许，这种改变可以释放诸如刘贺之类“土豪”的欲望，却无法满足不同人欲望。奢侈品之所以成为奢侈品，就因为它在消费中的稀缺性。稀缺，才能使奢侈品成为身份区隔。相对大众消费而言，奢侈品与其说消费的是物，不如说消费的是不能普及的差异。必须保持相对普通消费品的稀缺，使奢侈品不可能成为所有人欲望践行的对象。

一个不能满足所有人欲望的消费品，却赋予所有人消费的权力。看上去平等，实则隐藏了不平等。奢侈品的近代变革，为赤裸的不平等添加了一层暧昧的纱衣。轻衣薄纱在霓虹灯下弥漫着一种挑逗的幻觉——人生而平等。事实上，这只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开胃酒：打开欲望大门，却封闭了实现的路径。相对刘贺时代政治权力下的不平等，近代社会赋予的理论平等不仅在社会实践中无法实现，更有甚者，它激活的欲望还让人们丧失了“各安天命”的恬静。固然，强权控制的欲望有失公允，但没有额外欲望的社会，田园体验未尝不是一种心灵补偿。应该说，禁止的欲望与主体的平静，构成了古典奢侈品消费原则下的平衡机制。然而，以现代奢侈品为代表的欲望释放，破坏了这种不公之中的平衡，却又没有建立新的平衡。貌似平等给予，实则潘多拉不断撕裂现代人脆弱的神经，在欲望无法抵达的诱惑中沉沦。

欲罢而不能，成为现代性病症。如一场瘟疫，在高楼大厦中掠夺人类的心灵筹码，直至所有人在消费景观中成为“坦塔罗斯”。将自己儿子做成餐点戏谑众神的坦塔罗斯，被神祇们打入地狱：他就在水中，波浪在下巴下翻滚，当他弯腰喝水时，水却流失殆尽。他的眼前就是解渴的甘露，却永远喝不上。他抬头看见蜜水欲滴的生梨、鲜红的苹果、火红的石榴、香艳的无花果和翠绿的橄榄。这些水果似乎在召唤他的欲望，但他踮起脚时，就会刮起大风，将沉甸甸的树枝吹向无法触及的空中。可以看见的欲望，却是无法实现的距离，“坦塔罗斯”成为挣扎在欲望之海的现代人的寓言。

四

平等成为欲望的释放者，是“平等”泛化带来的结果。

人生而平等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是被动式（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字面意思是“所有人被创造为平等”。杰斐逊使用“创造”一词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也即，上帝创造之人是平等的。言下所谓人之平等，并非世俗社会中的人之平等。这里的“人”，被区分为两种状态：上帝创造之人、世俗社会之人。或许，正是认识到世俗社会对上帝创造的平等具有破坏力，杰斐逊才以上帝造人的平等作为逻辑起点，强调需要在世俗社会建立政府来保护人在上帝那里获得的平等。“创造”一词在法国《人权宣言》中被改为“出生”，从而让“人”告别了上帝的权力。这部人类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权宣言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

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人生而且始终自由平等，但其在公共利用上显出社会上的差别，与《独立宣言》有着类似的二分结构。只不过，与世俗社会的不平等相对的不再是上帝的平等，而是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平等。自然之人与社会之人的二元关系不是《人权宣言》的发明，被誉为“自由奠基人”的卢梭就一直坚持这一分析模型。在卢梭看来，人类不平等是社会结构性的，并非自然人的属性。他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正是人之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的对立关系。

所以，人生而自由平等，作为命题提出恰是揭示了不平等。无论将平等诉诸上帝创造的人，还是自然状态的人，都是社会人的对立面，用以强调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在二元关系中的“自由与平等”，对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而言，并非天生的、稳固的、永逸的主体属性，而是身处不自由、不平等中的自我觉醒，需要为之不断斗争的自我意识。因为不自由、不平等的绝对存在，所以需要《独立宣言》中的理想政府，需要《人权宣言》中的个体权利，并因此不断在运动中捍卫自我觉醒与自我意识。就此而言，自由与平等与其说是社会人的主体属性，不如说是主体被赋予的一种理想、一种意志。其思想发生应该是意识到不自由与不平等，故强调人之权利并不断斗争而趋于理想。这种模型下，社会没有绝对静止的理想状态，只有不断接近理想的斗争过程。也即，人生而平等不是静止状态下社会人的天然权利，而是身处不平等的枷锁中对平等的觉醒。

作为觉醒的“平等”，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毫无疑问，资产阶级革命期，它的动词属性改变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然而今天，“平等”越来越成为一个名词，成为被假定存在的主体属性。促使“平等”词性转换的因素很多，但消费主义盛行无疑最引人注目。因为，无论政府或宪法多么大声地宣告“人生而平等”，都没有商业生活在日常经验中给予的直观体验有效。商场的开放性与漫天广告，制造了无所不在的消费场。触手可及的心理体验，将现代人塑造为具有静态平等感的幻觉主体。仿佛，平等不要争取就天然存在。尤其，规模化生产与科技发展，推动了消费需求的不断满足。于是，“生活直觉”遮蔽了平等的动词机制，使其成为主体属性的名词表达。然而，福特汽车打造流水线显然不是为了人们平等的消费权。因为规模化成本永远是利润的保证与源泉，所以现代科技与管理不断介入产能的规模化。与之相应，数量惊人的工业品帮助人们在消费潮中重构了个体权利的想象。翻开二十世纪工业史，直观经验就是曾经的奢侈品在量化生产中不断普及。因而，奢侈品的演化路径成为现代性最为丰硕的成果，也成为现代性在价值进化上最显著的论据。人们，沉迷于进步的伟大逻辑，在奢侈品的普及中强化了平等幻觉。当汽车成为产业工人的代步工具时，现代性便具有了人文主义的魅惑力。

“平等”的词性转换，彰显的是机器生产的惊人效率，它在人类史上塑造了看似平等的生活体验。但无论成效如何辉煌，它却无法消除追求利润的动机与最终结果的悖论。正因为动机不是为了平等，而是为了社会财富因利润扩大而带来的分配不均，所以它在结果上制造的平等才更具危害。它将动词化的觉醒转化为名词化的权利，完成“平等”一词从抗争到安眠的转换，并将社会个体安置在消费主义的灯红酒绿中，成为继续追逐利润的庞大市场。可以说，因不平等动机而制造的平等结果在结构上具有决然对立的矛盾。遗憾的是，我们正处在这个机制运行最为顺畅的时代。科技进步释放的生产力不断加固它的虚幻结果，并遮蔽了它的本来动机。不断发布新品的消费浪潮中，奢侈品永远在消失的过程中重新诞生，紧张而快捷的更迭使人的欲望在短暂缝隙中不断满足与撕裂。身处消费链中的现代人，欲望不再是政治分配的结果，而是现代商业挑逗的结果。人在一次次量产的“奢侈品”中满足欲望，同时又被新的奢侈品塑造出看似触手可及的遥远企盼。作为身份区隔的奢侈品从未消失，而是以更迅猛的方式升级，在平等的名词化中释放了欲望，也构建出现代人苦闷、焦虑的“坦塔罗斯之苦”。

五

王尔德曾说：“最坏的奴隶主就是那些仁慈地对待奴隶的奴隶主，他们的做法妨碍了那些受奴隶制压迫的人去认识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今天，“平等”词性的转换亦然。甚至，较王尔德所说的奴隶主更“坏”的是，它的动机并非怜悯与善良，而是为了获得市场扩展的必要条件——消费者。也即，它的“仁慈”是一种圈养，为了从中获得更大的利润。今天，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巨大的“牧场”，圈养了大量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消费者，奔波在两个端点之间。维系奔波的动力就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刺激出的欲望。这套系统仿佛资本主义永动机，高速运转且效果良好。可以说，平等感带来的“欲望释放”维系了这台永动机，使每个“被圈养者”在机器中乐此不疲，根本没有“认识它的可怕之处”的机会。

为了配合欲望的持续与扩张，奢侈品也出现了虚假的满足机制。这要感谢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消费者在时间滞后中体验曾经的“奢侈”。并且，因科技进步的“摩尔定律”，这种时间滞后性越来越短促。或可说，现代奢侈品用自我更迭的方式满足了普通人。整个过程，仿佛是一场“消灭”奢侈品的革命。科技不断将“幸福”推送到普通人眼前，使他们遗忘消费背后隐藏的等级性，欢快地投身“牧场”的永动机。遗憾的是，科技推送旧欲望的同时，也创造新欲望。它用快速“消亡”隐匿“身份区隔”的同时，也创造新的坐标以实现身份的等级确认。仿佛一面双面镜，普及“奢侈品”的过程隐藏着难以普及的“区隔”。普通人只在镜子的一面自我陶醉，却没有看到“镜子”背后的镜面才是真正的奢侈。

绝大多数物质性“奢侈”都在科技发展中走向了普及。现代奢侈品越来越去物质化，也因此变得更加隐晦。当然，在奢侈品去物质化时，一类极具欺骗性的“奢侈品”开始流行。它们以物化商品的面貌出现，却非真正的稀罕、难得。除了被注册过的 **logo**，它们与普及性工业品并无区别。这些用巨额广告堆砌出“奢侈幻觉”的品牌，通过贴牌的方式将普通工业品“点石成金”，并赚取源于人性虚荣的巨额利润。应该说，它们的奢侈是人为强加的宣传，是对人进行欲望催眠的欺骗。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容易被仿制。或许，大量与其质量一致的“冒牌货”，恰恰彰显了这些所谓奢侈的品牌才是奢侈品中的“假货”。因为，真正奢侈不是宣传的结果，而是不易复制的稀缺性，是非量产的不可普及性。当“冒牌货”戏剧性彰显“假货”的欺骗时，当“假货”忙于维护虚妄的奢侈身份时，这个时代真正的奢侈品已悄然改变，并逐渐脱离物化的商品面貌。

去物质化的奢侈品是怎样一种状态？多年前的一个笑话，对思考这个问题或许有些帮助。曾经，一位富翁到海边度假，慵懒地躺在沙滩上说：终于可以躺下晒太阳了。此时，路过的渔夫笑道：我一生下来，就能躺在这晒太阳。确实，渔夫说得在理，很多人也因此嘲笑富翁。但问题真的如此简单？表面上，两人都在晒太阳。实质呢？晒太阳这一行为对富翁与渔夫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嘲笑富翁的人只看到了晒太阳的行为，没看到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富翁在财富的基础上，获得的是自由选择权，而渔夫没有这种权力。他们仿佛海上偶尔交互的船只，短暂相逢后将是完全不同的航向。晒完太阳的富翁可以选择到草原上驰骋，与牧民相欢笑；抑或到大漠闲游，与驼队相伴一程。但渔夫，却只能在原地看着太阳，日复一日撒网捕鱼。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在劳作与消费中奔波。

资本主义消费场中，富翁与渔夫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种”。亦如海边偶遇，他们会在很多场景中“偶遇”，诸如熙攘的卖场、酒店、机场，甚至穿着同样的“奢侈品牌”，等等。这偶尔交互的片刻，我们无法分清他们的身份。仿佛，他们正在平等地“晒着太阳”。实际上，看似平等的表象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生活是否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于是，“平等”中隐藏了两种迥异的命运：一类奔波在“永动机”中欲罢不能；一类脱离了“永动机”自主选择。前者，在自己生产并消费的轮回中身陷坦塔罗斯的苦恼，消费物对他们而言既是欲望的来源，也是对自身存在的遮蔽；后者，跳离了佛佛西斯的轮回，因财富而自主确定生

活，消费物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显现了自由选择权。抑或说，今天的“金缕玉衣”是一种无形的权力，隐藏在物化消费链的背后，成为不易察觉的身份区隔。

六

今天，真正的奢侈品不是特定的消费物，而是自由选择的权力。当然，与超市中拿取商品的自由不同，这里说的“自由选择”是指个人自由安排生活，乃至时间的自由分配。这种奢侈往往不是物化的彰显，而是低调的隐蔽。每次选择的具体结果或许并不特别，却可以不停地流动、延展，不受外在条件限制。奢侈品，由此转向物化商品的背后，转向人在消费中的心理体验，成为自由意志的显现。与具体物品相比，它仿佛一种透明的权力，附加在具体选择的物化物上。时常，我们会因为透明而对它视而不见，并在日常消费的“偶尔交互”中感受“平等”。殊不知，“自由”躲在“平等”之后成为真正的奢侈。自由与平等，这对看似孪生的思想术语，在现代机制的异化下成为奢侈品消费的两个端点，一显一隐地构建了现代人的命运指认：平等逐渐成为“永动机”内普及性的主体幻觉；自由，越来越成为“永动机”外奢侈的主体权力。

奢侈品退出了物质的消费类别，成为透明的“不可见”的权力。相对古典时代奢侈品强制分配带来的欲望压制，它采用了相反的手段——用“欲望刺激”制造虚幻的平等感。不平等则从显性的政治秩序走向了隐性的权力分布，因不可见而成为史上最隐蔽的不平等。或可以说，现代性用虚妄的大众平等掩盖了少数人的自由权力，并借助科技发展的迅猛趋势制造了施舍性给予的力度与广度。掌握这种权力的“人种”，冷静、礼貌地面对渔夫们的嘲笑，然后从容地践行自由，成为最具绅士风度的“奴隶主”。显然，只有当“自由”处于晦暗不明时，大众的平等感才会稳定、持续，才会因消费类别上的“偶尔交互”而忘乎所以。平等一词的动词机制也得以抑制，成为名词化的稳定幻觉。保持这种稳定至关重要，因为它会带来持续扩张的利润，膨胀的利润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少数者的自由权力。

今天所谓物化“奢侈品”，用品牌包装的“伪造形态”遮蔽了真正的奢侈，将不可普及的自由掩藏在平等的表象下，成为不易察觉的存在。这种“不可见”保障了大众虚幻的平等感，使之安然地在资本主义永动机中让渡“自由”。与自由伴生的平等概念，在虚幻的获取感中成为名词，成为主体假想的属性。它曾经的动词状态，在琳琅满目的消费场中一去不返。这，或许是最好的时代，又或许是最差的时代。它的好，在于向公众提供了抒情电影的催眠曲，讲述平等的奇幻构想——现代性的伟大成就；它的差，在于电影都是骗人的，真实被蒙太奇的唯美深深掩埋，成为少数人的自由乐园。然而，无论这个时代是好是差，平等的表面彰显与自由的实质隐藏，都处于运行最为顺畅的阶段。人们生于充满平等宣言的时代，安享它带来的幻觉体验，并快乐地将自己投身资本主义运行，成为少数人获取自由的动力与源泉。然而，这种至今为止得益科技发展而运行顺畅的机制，终将因科技的发展而面临崩溃。彼时，虚幻的平等将因自由选择的“不可隐藏”而遭遇瓦解。即便今天，自由选择在涉及身体的改造中，就显现着某种无法隐藏的“状态”。

海昏侯时代的奢侈品只是附加于身体之外的物件，无法融入生命的载体——肉身。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人试图通过丹药等手段将“奢侈”融入身体。但他们的努力今天看来却是些愚蠢的行为——不仅没有获得预期效果，甚至更早地结束了肉身存在。某种角度看，彼时的奢侈品只是身体之外的装饰，纯粹外于身体的点缀，无论有着怎样的区隔性，面对身体改造都没有区别。海昏侯、中山靖王对奢侈品的消费权无关身体本身，虽葬礼尊卑有别，但肉身却一致而且平等——终究荡然无存。

这种肉身平等在近代开始了微妙的转变。其中，改造身体最直观的手段是外科手术。关于外科手术，一般认为是近代西方医学革命的结果。但有些考古材料对此提出了“质疑”。诸如，2001年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392号墓出土了一个带有3厘米见方椭圆形

缺口的颅骨。有研究认为该颅骨缺口是最早开颅手术的证据，且断面呈现光滑均匀的圆弧形表明手术是成功的。因为只有缺口形成后仍长期存活，骨组织重新修复才能形成圆弧断面。然而，此类看法亦甚武断。颅骨因其他原因受损而存活，也能形成类似断面。又如 1991 年新疆鄯善县苏贝希村发掘的一男性干尸，腹部以粗毛线缝合刀口，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的腹腔手术。但这具干尸的伤口缝合，并不排除下葬时对伤口的处理。整体看，此类考古材料很难形成外科手术的全新历史，因为它们无法成为确证。至于《列子》记扁鹊换鲁公扈、赵齐婴心脏；《后汉书》言华佗剖腹去疾之类故事，只能当传说听听。

外科手术施于肉身，成为人类身体改造的萌芽。如果我们将医疗视作一种消费分配的话，那么较之装饰性的奢侈品，它对生命影响更为直接且重要。近代医疗革命逻辑等同于产业革命，是将医疗视作可以量产的产品。确实，伴随科技发展的节奏，医疗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提供者，也因此改变人类的平均寿命。某种角度看，医疗革命是现代性最伟大的成果，它从少数人走向大多数人，是历史上最大的奢侈品的普及化，是对平等幻觉的最大维护。那些人群中的大小医院仿佛现代文明的天使，直观地传播着生命平等的理想。但这种平等，会持续下去吗？答案，是否定的。

七

人们对医疗平等最直观的质疑，通常集中在医疗条件的不均衡——散落人群中的医院代表了不同的医疗水准，很难让人享受同样的医疗条件。于是，大小不一的医院成为平等理想下的不平等：平等，源自数量的普及；不平等，来自质量的不统一。以静态方式看，质疑是有效的——不平等的质量冲击了平等的数量，进而瓦解生命平等的社会理想。然吊诡处在于，现代性的动态逻辑中，这种不平等也恰恰彰显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并伴随科技进步而逐渐践行平等。举例而言，刚从实验室走出的药物代表了医疗消费的奢侈品，不可普及。然假以时日，它通过产业化链条不断渗透，最终惠及了大众。抗生素从稀缺药物变成大众药糖，正是这一逻辑的完美显现。所以，针对因医疗条件不均带来的不平等，如果给予耐心，我们仍有希望在它普及化过程中享受未来平等。或者说，医疗水准的不平等恰恰表征了某种未来的希望。确实，病人的想象亦如此——所有人在不同医院等待特效药的希望。因希望存在，不平等被视为某种可以容忍的暂时性不平等，而非永久。

现代医疗革命以希望的给予覆盖事实的不平等，近代以来不断进步的历史又塑造了公众对这种希望的接受，并在不平等的现实世界营造平等“共识”。每位病人只要没有走到生命结束，都会不断强化这种想象。健康人，则有更多时间等待它的未来实现。那些生命结束的个体，却因体验消失而不再影响活着的人。于是，“希望”成为现代性的承诺，将社会个体统一到某种美好未来的企盼，也因此强化了生命平等的预期，抑或理想。这是非常完美的逻辑——基于不断进步而实现平等。但事实果真如此？作为奢侈品的医疗革命，真会在不断进步中走向公众，成为所有人享受的未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入今天医疗“普及”的现实，看看是否存在非医疗技术而不能普及的医疗种类，进而追问何以不能？答案，隐藏在器官移植中。

器官移植，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医疗革命之一。它将健康器官移植到另一个生命体中，并使之迅速恢复功能，类似“扁鹊换心”。20 世纪前，此类手术只是传说。即便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医生对器官功能衰竭的病人都束手无策。1893 年，英国医生 Watson Williams 将羊的胰脏碎片移植给一位 13 岁糖尿病男孩，结果不意外，病人 3 天后因排斥反应去世。除此之外，医生还移植过兔子、狒狒、黑猩猩等各种动物器官，无一成功。今天的医学知识，揭示了器官移植最大障碍是排斥反应。且不说移植动物器官，就是移植人类器官都存在排斥反应。所谓排斥，是人体天然具有的免疫机制，对进入体内的外来组织加以识别、控制，乃至摧毁、消灭。正是这种免疫过程，器官移植通常败于术后临床表现出的排斥反应。就此而

言，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1954 年 12 月约瑟夫·默里（1990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波士顿进行的肾脏移植，并非彻底意义上成功的“器官移植”。因为这个手术移植的是病人孪生兄弟的肾脏，不存在排斥反应。真正的突破，是人类陆续发现了有效的免疫抑制药物——硫唑嘌呤（1961）、泼尼松（1963）、抗淋巴细胞球蛋白（1966）、环磷酰胺（1971）。此后，人与人之间的器官移植才从神话走向现实，成为 20 世纪医学的重大突破。时至今日，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的器官移植，几乎囊括了除大脑以外的所有器官——心、肝、肺、肾、胰腺等。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项已然成熟的技术并没带给人们足够惊喜。医院中等待器官的病人，往往在期望、焦虑与绝望的情绪中周转往复。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多的器官可以移植。基于人体器官来源的诸多不确定，需要移植的病人与器官捐献的数量不成正比。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大约有 200 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实际人数要远大于这个统计数据。仅全球最发达的美国为例，2015 年共完成 3.36 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却有 11.68 万人等待合适的器官供给，平均每天大约 22 名患者在等待中死亡。同年中国完成的肝脏移植手术仅 2000 多例、肾脏移植手术仅 5367 例。需知，中国人口基数是美国的数倍。在此数据基础上，加上世界绝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基数，我们可以轻松概括器官移植在供需关系上的严重失衡。想象一下，病房中抱有一丝希望的病人，在忍受病痛对生命侵蚀的恐惧中等待幸运之神的降临，同时却不断看到病友走向死亡。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摆脱病友的悲剧，而拯救命运的“医疗”看似如此临近，却又那么遥远、飘渺。

人类历史上，凡供需关系严重失衡——需求远大于供给时，奢侈品的权力机制便会彰显。两者构成一种正比关系：即需求越大于供给，权力就会越彰显。今天的器官移植，亦如此。20 世纪以来，“现代性”不断将奢侈品由显性转向隐性，塑造出人人平等的幻觉。但器官移植因供给的天然不足，导致这一逻辑难以为继。究其缘由，现代性是通过科技革命扩大“供给”，以改变供需关系的方式减弱权力机制的显现，从而实现对权力的隐藏。它将古典时代过于显性的权力分配转化为隐性的权力运营，出发点并非改变权力结构，而是供需关系的改造。于是，在 20 世纪现代性的“完美逻辑”中，器官移植成为一种逆流。它的技术并非针对供需关系，故而也就没有因科技发展而遮蔽权力机制，相反却因为科技革命凸显了从未消失的权力。

八

隐藏自由而彰显平等，是现代性成功的策略。它保障大众虚幻的平等感，也因此稳定了他们在资本主义永动机中的角色扮演。科技不断改变供需关系的前提下，该策略获得了最有效的运行，且成果丰硕。人们在“平等”的幻觉与企盼中，完成了现代性的人文主义平衡。可这种平衡非常脆弱，一旦真实利益的冲突激化，就会爆发各种各样的危机。有趣的是，因为信息化革命，人类与科技发展仍处于蜜月期，平衡依旧得以延续。即便面对二战这样的危机，现代性还是成功地重建了繁荣的“平衡”。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调却又和谐、统一的“平等”协奏曲中。遗憾的是，所有幻觉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漏洞，仿佛通往“真实”的心理间隙，躲藏在看似完美的协奏曲的角落。今天的器官移植，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漏洞。

一例器官移植的费用，往往是让人惊叹的天价。以北京为例，肾移植至少花费 30 万，肝移植和心脏移植则需要 60 万。加上术后终身服用的抗排斥药，将器官移植称为奢侈品中的奢侈品，应该没有异议。与历史上所有奢侈品不同，这种奢侈品不是虚幻的品牌炫耀，也不是置于身外的稀罕物件，而是生命本身。它不同于海昏侯没有用上的金缕玉衣，是物化为身体的奢侈品，是历史上最具价值的奢侈品。那么，这种奢侈品又是如何分配的呢？就程序而言似乎平等：基于配型相容的检测而分配器官。何为配型相容？在器官移植的中，供者和受者之间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容程度越高，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就越低，移植成功率和移植器官长期存活率就

越高；反之，就越容易发生排斥反应。配型相容就是术前白细胞抗原（HLA）相容度的检测。很显然，配型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权力的滥用，它是上帝预设的保持器官移植平等的“天平”。然而，看似天然的平等性在人类实践中，并非单纯的自然属性。从接收配型检测的机会而言，它往往带有社会选择的烙印。并且，由于检测结果并不要求绝对数值的匹配，而是数值范围的相适度，于是人为分配的空间也就相应存在。所以每位在医院挂号配对的病人，虽然持有HLA的幻觉平等，实际获得的机会绝非平等。只不过，隐形分配机制常常不为所察。毕竟，谁也不知道正在手术的器官是否更加匹配自己。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HLA是上帝预留的“天平”，用以预防人类权力。但它在践行天然属性的同时，也被人类异化为“平等幻觉”的理由。很显然，因为HLA机制存在，人们更容易忽略检测机会的“不平等”。

如果说，器官移植在受体方向上的不平等是隐性的，那么在供体方向上则非常显性，甚至粗暴。器官的个人捐献一直以来受到鼓励，但实际效果却不如人意。每年全球死亡人数与器官捐献的比例告诉我们，通过捐献来解决供给问题仍遥遥无期。一方面，供给严重不足；一方面，需求极为庞大。器官移植，仿佛人类科技带来的触手可及却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少数幸运儿获得救治，更多人在无限等待中消费那可怜的希望。正因为供给不足，器官来源在各种运作中常常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诸如，饱受争议的死刑犯器官，虽然越来越不被公开接受，但各类医院对器官来源的讳莫若深，暗示了某种仍然存在的机制。就伦理而言，器官除了自愿捐献外，所有政治、经济的手段都带有原罪，并在根本上冲击人的平等幻觉。它不仅彰显今天的权力结构，甚至暴露了人类社会永远存在的“黑暗辖区”。

印度东南部的金奈，正是这样的“辖区”。这座有着700万人口的城市，不仅是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也是器官非法交易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其中，交易量最大的就是肾脏，它因此被称为“肾镇”。调查记者斯克特·卡尼在《红色市场》一书中，为我们详尽地描绘了一颗肾的全球迁徙路线：“最底层卖肾人得到的报酬从750-3000美元不等，在印度国内做肾移植手术大约是15000美元左右，美国则需要262900美元。如果一个中介花3000美元从印度的贫民身上收肾，再以26万美元倒卖到美国，就实现了一颗肾从穷人到富人身上的转移。这样一张庞大的跨国贸易网也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人体器官漂洋过海，及时地从一个人身上移植到另一个陌生人身上，庞大的交易网络让人惊叹商业的高效之余，也直观显现了商业的冷酷与功利。在日常生活中，以琳琅满目的商品供给为表征的市场，扮演了“科技推动平等”之代言人的角色。但类似器官买卖的“黑暗辖区”，却赤裸裸地彰显着权力从未平等的本色。商业机制，释放现代人之主体想象的最大建制，仿佛贾瑞的“风月宝鉴”，一面是可人的王熙凤，一面是狰狞的骷髅。

跛道人把“风月宝鉴”交给贾瑞时，嘱咐只看骷髅的一面。因为这样就能刺破主体的幻觉，远离风月。遗憾的是，贾瑞贪图镜中的可人儿，乃至黑白无常拿他时还不忘要带着“宝鉴”。现代性彰显平等而隐藏自由，亦然。一方面，它制造人人平等的场域，塑造了沉迷其中的现代人的主体想象，并假借这种想象完成人的行为规训；另一方面，它将权贵化的自由小心隐藏，剔除真实的“不平等”，使之远离现代人的主体感知，以确保平等幻觉构建的社会平衡。从某种角度看，平衡是脆弱的，往往依托对“进步”的信仰而建立希望中的“平等”。或者说，希望带来的幻觉犹如贾瑞“宝鉴”中的王熙凤，为现代人沉迷于平等提供了“风月”对象。但类似器官移植中的“黑暗辖区”仿佛现代性的巨大伤口，不断暗示“真实”的存在，亦如“风月宝鉴”的另一面——真实的“骷髅”。

九

如果“希望”是一种策略，是不平等的现实制造平等幻觉的“策略”，那么面对器官移植，这种策略仍能发挥作用。为什么？因为人们可以企盼科技逐渐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之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方向只是手术本身，而非手术所用的器官。但近年生物科技的发展，

促使人们将“希望”投诸人造器官。媒体不断发布生物工程的全新进展，现代人的希望便被重新定义，成为一种可供依赖的心理期盼。是的，当美国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沃特·吉尔伯特宣称人类最终将用生物工程的方法培育人体所有器官时，“希望”被确定为不远未来的“安排”。面对如此肯定的预期，暂时的不平等再次被平等预期淹没，现代人的“风月宝鉴”充溢王熙凤俏媚的微笑，真实的骷髅永远置于不可见的“背面”。至此，现代性的平等感再次获得了心理验证。器官移植，这种显现现代奢侈品消费原则的创伤，得以在科技进步的幻觉中愈合。平等安眠曲，在现代生活的角角落落遮蔽了不和谐的杂声，成为政治正确性的来源。一切，看上去仍然美好。

然而，医疗革命在器官移植领域可以通过人造器官的技术补丁弥合物化奢侈品的消费差异，却无法填平这个时代真正的奢侈品——不可见的自由选择。让我们将目光回到笼罩着平等曙光的器官移植中。显然，曙光来自“欲望”未来的可实现。但科技与欲望的关系，并非静止状态。比如，器官移植过去引发的“欲望”是手术本身能成功。但手术技术完全成熟后，欲望却发生了转移。今天，器官移植引发的欲望是供体的充足。因此科技升级不仅带来欲望的满足，也带来欲望的升级。人之欲望从来不是先验静止的，而产生于“个体与环境在结构上的交互过程”。这个结构中的任何变量都会带来欲望的重新生产。科技，正是现代社会提供的最大变量。今天的科技与欲望之关系成为一种寓言：一方面科技是欲望得以满足的动力，一方面科技也是欲望生产的源头。现代人的欲望在科技动态的不断更新中仿佛“理想投射”的万花筒。也即，科技不仅是欲望的温柔乡，还是欲望的手术刀。它通过“满足”来切割欲望认同，剩余物则指向永恒的匮乏。这是有趣的纠缠：科技用自身进步满足欲望，同时也揭示了满足的暂时性，或者说是欲望认同的虚幻——仅是对“永恒匮乏”的暂时遮蔽。因此，欲望成为现代人的“符号”，表征主体在永恒匮乏中的虚假满足。欲望的满足恰恰揭示了匮乏的存在，这看似矛盾的定律，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尽情演绎了现代人的“坦塔罗斯之苦”。

医疗革命中的器官移植，正是显著的“欲望机制”之一。它通过未来的“保证”构建“希望”，并以此遮蔽现有不平等。主体因而投射现代性“自我”——平等属性下的个体。但如此自我并非真实存在，是被制造出的“投影”。保证类似影像的稳定是现代社会构建秩序的重要前提，而科技发展无疑是“保证”的最大神话。从牛顿到居里夫人、从爱迪生到爱因斯坦，科学技术改变生活的历史已然成为宗教，建构现代人的认知基础，以至在生活中创造新的信仰——将困境交付科技的发展。就本质而言，这种心理类似“去除了仪式系统的宗教”，属于信仰的范畴，是一种精神寄托与终极关怀。成为宗教的科技与科技本身是两回事，前者是认知信仰，是社会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对科技实用史的确信，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未来的企盼。企盼作为心理体验，就是欲望的载体。由科技信仰带来的企盼，恰是现代欲望的制造机器，不断创造“研发——生产——消费”的循环。甚至，科技消费的规定性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重构生命的体验：人一方面享受科技带来的改变，一方面承受科技对生活的重新规定，乃至控制。所有控制中，最大的控制就是精神控制。显然，精神控制的锚定是给予对象“希望”。宗教、政治等等，莫不如此。科技创造的未来想象，亦然。人们因为信仰科技带来的变化正步步接近，于是“希望”便成为现实的麻醉剂，成为遮蔽当下“不平等”的麻醉剂。现代社会的秩序构建，需要参与者接受这种麻醉，将“不平等”进行最大程度隐藏，以便所有人在“平等”幻觉中接受现实、安于现实，并成为现实得以稳定、持续的捍卫者。只要不断给予新“希望”，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就因“未来”的触手可及而成为暂时，且因其“暂时”而得到接受乃至遗忘。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魔法——将旧秩序中“对不平等的强制固化”转化为“对不平等的隐蔽消化”。

只有将“不平等”从显性合法转变为隐性合法，人类数百年努力构建的新秩序才能得以稳定。这一过程，肇始于科技进步带来的工业化大生产——大生产带来全新“聚集形态”与

“消费形态”，导致“人类应该怎样群居”的思想发生变化，并出现众多社会理想的构建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式样的“革命”。然而，以思想革命与社会运动为共振的转变模型，虽然不断带来改变，其副作用——社会动荡却一直未曾消失。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剧烈震荡，人类开始将“希望”投诸“变革”的源头——科技进步。

十

科技没有让人“失望”，经历数百年累积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进入爆发期，推动了社会的迅猛发展。相对思想带来的革命，科技推动的变革更为温和、稳定，也更“流畅”。几十年来，科技与社会协同共进的“历史”，催生了罕见的“集体乐观”——人们相信自己处于永远进步的趋势中。年年发布的诺贝尔奖，都是科技信心的普及与宣传。仿佛人类群体化自我催眠——持续构建伟大神话。事实亦然，科技不断带来炫目的力量，裹挟着这个星球走向狂欢。以至人类思想越来越务实——喜欢直观实际效果，疏离形而上辨析。全球范围内的大学校园以及知识界，人文艺术学科相对自然科学的式微，正是这种情绪的外化。

但在科技成为信仰的时代，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科技本身的发展与科技成果产生效应是两回事。很遗憾，漫长的蜜月期中，这个问题被不断凸显的“科技功效”遮蔽。正如二十世纪下半叶生产力突增，在解决基本生存中不断消灭曾经的“奢侈品”，带来社会整体的乐观情绪。从某种角度看，这将是所有人怀念的时代，因为科技带来希望——人们学会了接受、等待。社会进步，变成美妙的温水煮青蛙的模式。不知不觉中，我们改变了世界乃至自身。然而，推动科技进步的资本却不是慈善赞助人。从环球大发现背后的葡萄牙王室，到医学实验室背后的医药公司，资本不仅在科技源头植入意志，更在科技运用中实践了权力。虽然少数精英心中，求真才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但这对科技的社会普及并没有太大影响。对普罗大众而言，他们不真正关心科技本身获得怎样进步，而更注重为自己生活带来怎样改变。或许，这种务实态度使资本借助科技的长袖之舞，更加婀娜。

科技功利主义得以广泛流行，得益于近百年教育中的常见话语——科技的直观实用证实了科学精神的价值。从“认知世界的方式”转变为“改造世界的手段”，近代科学逐渐告别亚里斯多德、笛卡尔式“综合人文”的学科身份。科技的实际可检测越来越成为主流，并不断以“功用突破”强化世俗认知中的功利主义。相对二十世纪革命思想对“不平等”猛烈攻击带来颠覆性的社会不安，科技推动发展的务实更像历史的麻醉剂，抚平曾经的“动荡”。表面看，这是人类最高效、最现实的发展手段，它将“欲望”转变为“希望”——不同于宗教的虚幻，是实实在在的“未来承诺”。如果说，二十世纪开启了人类思想对“不平等”最为深刻的“审视”，那么同时，科技也推动了人类社会对“不平等”最为成功的“隐藏”。问题是这种“隐藏”可以持续吗？也即科技的麻醉，能够永远生效吗？如果，科技不断满足所有人欲望，答案是肯定的。人类与科技的“蜜月”告诉我们：科技可以通过欲望的“暂时满足”不断隐蔽欲望的“难以满足”。但它也存在一个前提——这个世界能否承载所有“满足”？我们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允许所有人欲望得到满足吗？

仅今天而言，美国能耗如果普及全球，地球就无法承受。显然，自然环境存在某种人类欲望的承载限度。近世科技的迅猛发展，快速缩小我们与“极限”的距离。最近，人体检测出多种微塑料污染，似乎表明“极限”近在咫尺了。当然，科技发展有时也会改变“极限”，诸如石油替代煤炭，曾极大拓展了世界对于人类欲望的承载能力。但这只是过去的经验，是否永远适用于未来，却值得怀疑。今天看来，科技进步有着解决一切的“魔力”：能源紧张时，科技带来新能源；水资源紧张时，科技带来海水淡化；食物紧张时，科技带来转基因……似乎，一切今天的困境都能在明天的科技中找到解决之道。人类欲望，从没有这么一个“温

馨”的突破口，能不断地因“希望”而给予“满足”。在科技刷新想象力的时代，似乎对科技的任何预设都是不明智的——时至今日，用科技解决具体问题的潜力仍然巨大。但这不意味我们对“科技与欲望的关系”束手无策，毫无判断。也许，科技会发生怎样具体的功效，我们从无判断，但其终极逻辑却是可以审视的。正如中学数学的选择题，代入任何中间数值都得不到答案，代入某些极限数值（如零），却能获知答案。那么人类欲望的极限值是什么？显然，是“永生”。永生在欲望的谱系中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自古就是地球上“掌权者”和“富有者”的终极追求。当然，也是普通人希望想却不敢奢望的“奢侈品”。从童男童女前往东海求取神药，到各式各样的灵丹仙药，永生被包装为“长生不老”的企盼，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未谢幕。

十一

“永生”作为奢侈品的终极 boss，迄今仍是一种不能抵达的“欲望”。无法实现却又强烈企盼，催生精神上的“虚拟满足”。“事死如生”的社会观念，恰是此种心理的行为表征。巨大的陵寝、炫目的葬品，宛如生活本身的拷贝，墓葬成为“永生”心理的物质载体。1993年，当河北张家口宣化区辽代张文藻墓被打开时，壁画鲜艳，棺前木桌上竟然保存了入葬时的酒菜：刚刚烹饪的菜肴，水果、干果和葡萄酒一应俱全。主人仿佛从未离去，一直享用着一次永不停歇的盛宴。对张文藻而言，现实的死亡似乎是通往彼岸的大门，墓葬被想象为“生活于此”的美好场景：墓室的空间划分、壁画描绘以及食物组合，共同形成具有象征性的“界域”，直指精神世界中的极限“欲望”——永生。棺前真实的酒食、画中备茶的童子，一场“真”与“幻”的视觉结构跨越时空限制，安放逝者永不消逝的生死隐喻。在此，生前与身后是并未断裂的世界，是“虚拟体验”连通的欲望之河。

“虚拟”，今天越来越物质化——多被塑造为电子世界对人类知觉系统的改造式体验。但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虚拟更是一种精神催眠，完全依靠信仰力量。尤其世俗生活中，人们借助不断强化的心理暗示，实现“相信”的满足感。张文藻相信墓葬作为永生场所，如此；海昏侯相信玉器与灵魂的关联，亦如此。今天，我们很难判断这种“相信”的程度，但从他们热衷于墓葬的营建看，“生命永续”在现实的不可能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最起码，想象的世界中，永生的欲望能够得到些许寄托。但是，也许古人对此还存在稍许困惑，抑或疑虑：亡去的世界真的存在吗？2010年，山西高平市汤王头村发现的一座晚唐五代砖墓，墓室东口左侧用朱砂写了一句诗：“墓有重开之日，人无再少之颜。”看上去有些惆怅的语句，带着一点淡淡的哀愁，传递古人对于生命流逝的无奈。

为了对抗真实世界的生命终点，人类在“虚拟”中找到信仰。虽然这种努力对避免死亡毫无作用，却行之有效地缓解了“死亡之惧”。二十世纪以来，虚拟的“自我催眠”越来越遭遇否定。科学描绘的世界，身后永生已无想象空间。还好，仿佛一种回报，科技剥夺了人类幻想永生的权利，却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资丰沛”。一个历史上从未有的物欲释放的时代，每个人都似乎“获得”告别匮乏的“承诺”——新的世俗生活的信仰。琳琅满目的商品触手可及、安然富足的生活宛若眼前，直观宣布了现代人的权利。科技在不断满足欲望的“过程”中，重建现实秩序。科技与欲望，成为互为推动的结构，并保持稳定的前进步伐。这虽然是一个身后漆黑的时代，却是生前光明的时代。看上去，用身后虚无缥缈的想象换来实实在在的生活，是个不错的交换。

科技不断满足欲望，仿佛这个时代最奇妙的神话。它巧妙隐藏了“欲望实现”中的不平等，在科技与欲望互为推动的今天，使“平等”鲜活地存在于人类观念中。然而，这种机制可以成为人类的“永动机”吗？答案，并不乐观。显然，人类放弃永生幻想，并非这个欲望消失了，而是因为科学的世界观不允许。用身后想象换取现实生活，只是一种被动的、不得已的接受。所以当科技推动欲望不断前行，终点仍将是那个被迫放弃的想象——永生。只不

过，此时的“欲望”不是身后幻想永生，而是生前享受永生。但问题在于：我们走近这一目标时，科技与欲望的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永生，是欲望满足的极限，也是一种临界点。它的到来，将改变人类发展的所有逻辑。或可以说，它是一场针对现代社会的“终极审判”。之所以说审判，是因为永生作为顶级奢侈品，将瓦解现代社会科技与欲望互为推动的“完美结构”。今天，人们在这种结构中安享平等幻觉，等待科技发展带来的美好未来，麻木于现实隐蔽的不平等。但这一切，都将因为永生的到来而被打破。似乎，人们对此尚未察觉，仍沿着科技与欲望的互动逻辑企盼永生。

十二

2012年3月，俄罗斯媒体大亨德米特里·伊茨科夫(Dmitry Iltsov)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未来2045年国际会议”宣布了以永生为目标的研究计划。这是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又称“阿凡达计划”——它试图将人类意识移植进机器身体，以实现长生不老。听上去，计划有些疯狂。人与机器合成，是否挑战了人的自我定义？我们如何区分自然人与机器人？一系列关于人的伦理问题，因此成为焦点。类似讨论，遮蔽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谁能获得永生权力？无论喜欢或不喜欢，面对永生，人类会如何选择？几乎可以肯定，它将成为大多数人的绝对选项。所以，“阿凡达”惊扰的伦理不安并非问题根本，问题在于：“永生”的权力将如何分配？又是如何构建社会秩序？比如，将永生的实现方式换为更容易接受的“选项”——类似于干细胞、纳米机器人等医疗技术，使“永生”成为医院普及性的治疗手段，不再涉及人的伦理问题，它就皆大欢喜了吗？答案，恰恰相反。永生的到来会瓦解今天社会巧妙遮蔽“不平等”的运行机制，破坏大众关于“平等”的获得感，并将所有人暴露在赤裸裸的“不平等”面前。

谷歌首席未来学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预测2029年人类就可以实现永生。因为过去30年里，他精准预测了一系列科技发展的节点，所以人们为他的断言欢欣鼓舞。充满想象力的纳米机器人，将成为肉体健康、永存的卫士。较之古人的金缕玉衣，这种想法不是来世幻觉的保证，而是今世肉身的得道成仙。然而，所有畅想遗忘了一个现实：永生还未降临之际，就有人成立“永生基金”。这个基金不是赞助技术研究，而是以股权投资方式实现资本增值，以确保基金拥有者未来成为永生技术的享有者。为什么需要基金保障？因为永生不是普通消费品，而是不可普及的“奢侈品”。它的不可普及，或许不是因为成本，而基于地球无法承载永生普及的最终结果。显然，这个世界无法接受所有人永远存在——人口呈几何级数的爆发。

当然，有一个选项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以肉身实现永生，而将个人记忆上传电脑，成为网络世界的人。听上去，这有些令人不适，实际效果却也不差。数字化的世界中，每个“生活的人”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获得与“实在空间”完全一致的感觉体验，比如一顿美食、一次旅行，抑或一场爱情。如果所有人都用这种电子模型实现永生，倒也好说。问题在于，肉身永生与电子永生同时出现呢？就科技发展的路径看，如果人类真的能现实永生的话，这将是大概率事件。此时，所有人在死亡时都将面对选择，是留在已经熟悉并习惯了的肉身世界，还是前往数字虚拟的世界？答案，非常清晰以至无需回答。当所有人都选择肉身永生，实际却不能满足时，什么原则能解决永生的“分配”？相对有史以来所有消费品的分配，这将是一次终极考核。现代社会在商业运作机制中，尚能维护人类脆弱的“平等幻觉”。但面对永生它将何去何从？永生不同于任何商品，它是直面死亡——终极命题的消费，是欲望最大的实现形态，也是欲望最天然的、无需外力塑造的、最为原始的形态。就本能而言，“避免死亡”是人类的元欲望，是每个人都会产生冲动的“必需品”。因此，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奢侈品，它是个体欲望必然选择的“消费”。

科技不断满足欲望的逻辑，至此出现终止符。这当然不是科技的错。因为科技解决一个

人永生，就能解决所有人的永生之欲。遗憾的是，科技实现终极欲望——“永生”的同时，它“遮蔽不平等”的价值就会立刻消失。绝大多数人都将面对：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永生的权力。每天发生的“死亡”，仿佛将要提醒所有人——自己不会那么幸运。于是，科技这一现代传奇在巅峰中瓦解了自己的催眠价值。曾经作为平等幻觉的麻醉剂，最终摧毁了平等的幻觉，揭示最大的不平等。永生——科技发展的终极成就，将成为现代社会构建平等幻觉的终极审判。从启蒙运动开始建立的人类理想，将因此落下帷幕。因为，现代社会秩序的首要前提，就是将“不平等”从古典时代的显性合法转变为隐性合法，并在直观层面上赋予社会参与者平等的权利。只有相信这种平等的既定存在，人们才会安于现实的社会秩序。遗憾的是，永生作为奢侈品将最大限度瓦解该前提，所有人都将直面最真实的“不平等”。

十三

科技“不断发展”而被平等消费的预期，因“永生”彻底终结。不同于既有科技成果，永生使科技脱离人的工具范畴，成为人之存在的组成部分。此时，科技推动供给的逻辑戛然而止。科技成为人本身，成为迄今为止最奢侈的“奢侈品”。科技从满足欲望的奶嘴转身，成为大多数人的“坦塔罗斯”——直观可见的“不平等”。此时，科技与人类的关系得到彻底检讨。布鲁诺、蒸汽机、牛顿开始的“科技造福全人类”，将遭遇价值观的全面瓦解。或许，“科技造福全人类”只是人类美好的“幻觉”。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对“幻觉”的批判往往指向“奇点”想象——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成为控制人类的新物种。事实上，这种担心遮蔽了现实更为迫切的问题：我们习惯认为的科技促进平等，真的存在吗？

科技促进平等，已然成为常识。尤其互联网时代，信息、知识、应用与服务，都因科技进步而获得重新分配，更多人享受看似“无差别”的全新体验。每次科技进步带来的改变，从食物、用具到消费模式，改变了所有人生活方式。人们在日新月异的分配结构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似乎，现代生活就是将曾经的身份规定进行格式化，并试图给予理想化的大同世界。事实，果真如此？真相或许与常识相悖。深入研究会发现，科技迅猛发展并没有消除差异，相反是在强化差异。比如，美国信息化革命的数十年来，贫富分化不但没有减缓，相反日益强化。据 2016 年安联全球财富报告，美国基尼系数已达 0.81。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财富绝对平等为 0，绝对不平等为 1。基尼系数 0.81 意味着绝大部分财富聚集到了少数人手中。并且，这一现象不是美国独有，而是全球性的。甚至，它也不只是今天独有，而是历史长久以来存在的。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证实：从史前开始，科技发展的结果就是“不平等”。狩猎采集社会的基尼系数约为 0.17，小规模园艺种植及低密度农业社会的基尼系数为 0.27，大规模农业社会的基尼系数为 0.35。进入现代文明后，基尼系数迈入 0.5 大关，并且一直未曾回头，直至今天。

何以如此？秘密隐藏在掌握科技的权力与人的自利本性。科技推动了劳动产出的扩张，那怎么分配超出基本生存的产品？显然，科技发现者、控制者倾向于将它们据为己有，并逐渐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生产资料的物化占有，成为分配机制的优先享有者。优享机制使社会组织开始异化为权力体系，成为保障分配不均的政治结构。所以科技越发达，产出产品越丰富，优享机制就越发带来不平等。但为何会出现“科技推动平等”的幻觉？原因在于：科技会改变每个时期的基本生存条件，带来共享机制。何谓共享？就是科技迅速扩张财富时，在优先机制生效的同时，部分财富会分配给不掌握权力的普通人，用以改变整体生活。“科技推动平等”，正是共享机制在时间轴上造成的假象。相对过去，基本生活条件改变使我们产生平等化错觉。然而，共享机制带来的纵向幻觉是对横向生效的优享机制的遮蔽。现代性的魔术棒，亦源于此。从蒸汽机发明开始，共享机制让人文思想走进自我催眠：快速进步可以让社会不断接近“平等”。遗憾的是，足够丰富的共享机制的另一面，却是足够庞大的优享机制。这，导致了今天越来越不平等的尴尬现实。

优享与共享同时运行的分配机制，是科技创造财富并推动社会运转的内核。古典时代，优享机制以特权形式被彰显，成为形塑政治结构的驱动力；进入现代，特权化优享机制逐渐从显形转向隐性——财富增量带来的共享机制越来越凸显，以至隐蔽了优享机制。从某种角度看，现代性的成功恰恰是借此形塑了全新的权力体系，以隐藏不平等的优享机制催眠现代人，使之安然于巨大的生产与消费的“装置”中。从某方面看，这是权力运作的一种完美技艺——不再简单暴力地压制反对力量，而通过利益分配实现反对力量的转化。即便今天的贫富分化比 100 年前严重，但今天的“穷人”比 100 年前“穷人”拥有的财富要多，消费体验甚至会在某些领域超越过去的富人。于是，平等幻觉被“科技进步”打造成为了一种正在进行的时态，人们对平等之实现充满希望，对科技与平等的潜在认同毫无怀疑。

十四

相信科技推动平等，是现代社会的神话。它的生效机制与古人对“不可知”的敬畏、尊崇相似。或可说，近代科技打破了在“政治不平等”原则下建立的优享与共享的古典平衡。优享机制不再依靠强制性等级划分，而成为隐性的选择权力。共享机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放大，伴随现代性的步伐，处于一种乐观效应的蜜月期。确实，从机器生产到信息革命，科技急剧扩大了产出数量。迅猛增长的社会财富，不仅扩张优享机制的分配权益，也使共享机制得到全面增长。受益于这种增长，科技推动平等逐渐成为现代性“共识”。但今天，共享机制带来的蜜月期正在消退，科技的财富集中效应越来越从隐性走向显性。

诸如被称为“铁锈地带”的衰退与失业问题。铁锈一词，是非常形象的比喻，是指老工业基地（如美国俄亥俄州、德国鲁尔区、伦敦工业区等）在经历重工业化的繁荣后走向衰落，到处是闲置厂房和被遗弃的锈迹斑斑的设备。铁锈既是时间的荒芜，也是人的荒芜。大量失去工作又缺乏新工作机会的人，成为铁锈背后的主体，成为现代社会一路狂飙留下的崩溃征兆。显然，这些充满败落怨气的地方恰是特朗普 2016 伟大逆袭的票仓。为什么？因为衰败被认为是国际贸易带来的，人们需要一位能够给自己带来复活机会的领导人。或许，发达地区的铁锈，因国际贸易中更廉价的劳动力而加速衰败。但衰败的根本原因，却不在此。导致铁锈地带出现沧桑锈迹的原因是科技。与衰败相对的繁华并非第三国的廉价劳力，而是硅谷的不夜城。究其缘由，则是科技带来的共享机制似乎正在消退。

共享机制是现代科技盛开的罂粟花，美丽而灿烂。但它并非科技的天生需求，因为科技从来不是慈善家。共享机制之所以带来改变，是基于“科技扩张生产”需要人的劳动。因为人的劳动才能推动生产，所以财富增量就能分配一部分给予劳动者。于是，少数人的优享机制之外，多数人的共享机制获得快速发展，并形成“科技促进平等”的现代神话。然而，这种共享推动与“科技每增加单位财富量需要多少人力的介入”成正比关系。伴随科技发展，每增加单位财富量所需人力越少，共享机制的生效就越弱，直至接近临界点而产生反转。不幸的是，我们正在面临这一临界点的到来，铁锈与硅谷的兴衰更替亦源于此。因为现代科技方向就是不断减少人对生产的参与，其内在逻辑导致优享机制不断挤压共享机制。显然，掌握权力的人愿意获取“科技取代人力”带来的利益最大化。不正视这一趋势，将“铁锈困境”简单看作国际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势必带来误判，催生民粹化的极端右倾。

避免类似误判，需要调整科技与平等的认知基础。借助科技力量，古典时期以优享为特权的分配结构，顺利实现了以共享为显性因素的现代转型。与之相应，很多曾经的奢侈品在共享机制助力下成为日常消费品。奢侈品从物化形态转向“不可见”的隐蔽形态，成为平等感获取的重要注脚。但促成这些美好景观的科技力量，却在“利益最大化”中走向现代性幻觉的反面。优享重新彰显它本来的面貌，吞食现代社会脆弱的“平等”。优享与共享，正在发生全新的结构调整。共享逐渐丧失了数百年来掩护优享的功能，越来越无法承担社会抚慰

剂的角色。失去平等幻觉的抚慰，现代社会就如同失去润滑剂的机器，将直面所有零部件脱离原有规定的尴尬局面。显然，通过共享机制实现对自由的隐藏而彰显平等，是现代性最为成功的策略。它通过给予虚幻的平等感，稳定了大众在“生产——消费”无限循环中的角色扮演。一旦优享机制重新回归，成为社会的显性要素，势必对启蒙运动以来构建的人文想象造成毁灭性冲击。

就此而言，永生作为奢侈品的终极产品，因无法掩蔽的消费属性将成为压垮现代社会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彼时，审判即将开始！试想一个社会中，少数人永远存在的生命将会成为多数人面对死亡时最大的参照物、最刺激的镜面，也将是最无法掩饰的“不平等”。如同一个疲于生活的六十岁退休员工，面对看上去二十岁实际却已百岁的老板时，任何关于平等的“说辞”都将灰飞烟灭。永生技术将生命的时间转化为商品，一种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奢侈品——无法共享的奢侈品，将会赤裸裸彰显优享机制带来的“不平等”。如果，古典时代特权化的优享机制还可以用死亡抹平，成就大家“众生平等”的幻觉的话，那么永生带来的优享机制将永远无法抹平“不平等”，是一种直观可达的公众创伤。

所以，面对永生就是面对人类的终极“不平等”，是一次历史上所有平等理念的终极审判。所有人将不得不接受：“平等皆虚幻，唯不平等才是真实”。因为人类历史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我们不得不在理念上制造各种秩序维护的合法性说辞。君权神授下的特权，是一种说辞。人人生而平等，亦是一种说辞。从某种角度看，这些“说辞”是一个社会获得平稳运行的重要前提，是人们或直接接受、或催眠接受“不平等”之现实的重要前提。但未来，当永生彻底瓦解人类历史的所有“说辞”时，我们又将如何催眠社会个体，让他们接受“不平等”，并确保社会结构的持续稳定？

或许，这是人文学科最大的危机；或许，这也是人文学科最具价值的挑战。

2018年12月30日于后沙峪